

宋代耕牛价格水平蠡测

唐 晔 张 婷

内容提要:本文对宋代耕牛价格进行梳理,推测出北宋耕牛市价通常不超过10贯铜钱,折米不超过5石,大约是一个宋代5口之家百余天的口粮。而南宋由于战争等原因,耕牛价格则大大上升,其名义价格在南宋初年飙升至百贯左右,即使到了物价低平的中期也维持在至少40贯上下,折米约20石,约是一个5口之家400余天的口粮。耕牛价格的变化显示了南宋农户在获得耕牛这一基本生产资料方面大大难于北宋,由此也可看出北宋经济状况应当优于南宋。

关键词:宋代 耕牛价格 农业

对于农耕社会来说,耕牛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小农家庭维持生计的根本,是以宋人有“农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耶!较其轻重先后缓急,宜莫大于此也”之论。^①由于家庭生产规模等原因,小农家庭耕牛自给率却不高,有相当部分的农户须要通过市场来购买耕牛。价格是市场的核心,它既是商品供求关系晴雨表,又是生产成本的显示器,从这层意义上讲牛价的社会影响极大——有欧洲学者甚至提出,中国耕牛价格高于欧洲,是中世纪晚期开始的中欧农业大分流的两大原因之一。^②

那么,中国古代耕牛价格究竟什么水平?农户买牛的负担有多重?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古代耕牛,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其关注点多集中于耕牛的使用与饲养,^③而对价格却鲜有涉及。就笔者所见,目前只有程民生先生《宋代牲畜价格考》对牛价有所涉及,^④不过其内容更多是对有关史料的梳理,而未作专门、深入分析。有鉴于此,笔者欲对中国古代社会耕牛价格进行考证,本文为系列之一,以两宋耕牛价格为中心。并据此评估当时耕牛的社会供求状况,进而说明两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变化。

在方法上,本文将尝试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古代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取得系统、精确的数据,本文同样面临这样的困难。有鉴于此,本文并不打算描绘一条全面、准确反映两宋时期全国各地牛价变动的数据曲线,而是要考证出某些时段、地区的耕牛常价,而后结合当时社会经济状况,

[作者简介] 唐晔,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研究员,河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保定,071000,邮箱:tetyty@163.com;张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讲师,保定,071000,邮箱:wxyz82@163.com。

① [宋]陈旉:《农书》卷中《牛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皮特·佛德瓦里(Peter Foldvari):《缩小差距:探索中世纪之前的早期经济》,“不利的气候条件使得中亚和中国的资本品,特别是耕牛,价格较高,阻碍了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土地单位产出的提高,而在欧洲役畜,特别是马的增加则带来了更高的人均产出”以及“在亚洲和欧洲大陆先后引入短期地租合约的情况下,中国相对于欧洲较低的工资/地租比不利于对资本品投入的激励,这两大原因推动了中世纪晚期开始的中欧农业大分流。”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论文,转引自赵学军《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侧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③ 有代表性的有邢铁《宋代耕牛出租与客户地位》,《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李根蟠《中国精耕细作的两种类型和牛耕使用的变化——关于传统经济再评价的两个问题》,《史苑》第八辑;程念祺《中国古代经史中的牛耕》,《史林》2005年第6期。

④ 《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判断其在宋代牛价曲线上的位置,从逻辑上反推两宋时期牛价的大体水平。

此处所谓“常价”是指正常年景(即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下的一般价格。依照马克思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经常波动,而价值则相对稳定;当外部冲击导致供需失衡时,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的古代市场,这种波动会显得尤为剧烈,史乘中不乏天灾人祸之后牛价“腾涌十倍”之类记载;^①但在正常年景下,两者会基本趋同,本文“常价”指的就是这种正常情况下的价格。因为常价具有趋同于价值这一特性,所以我们找到很少的几个常价就可以断定当地耕牛的价值或价格水平。

一、宋代耕牛市场体系基本状况

市场体系是价格形成的基础,有必要在分析牛价之前对宋代耕牛市场体系做一简要分析。总体而言,宋代耕牛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体系,主要体现为:首先,耕牛价成主要由市场形成。尽管两宋时期是中国史上禁榷制度的高峰期——盐、铁、铜、锡、茶、醋、酒、曲、香、药凡此等等,几乎一切有利可图之商品都遭禁榷,但耕牛却是例外,政府很少直接干预耕牛市场。宋廷对于耕牛市场影响主要通过减税、保护耕牛等间接手段来实现;其次,宋代耕牛交易量巨大,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古代社会中多数商品未能形成全国市场,但牲畜具有自行能力,运输成本相对要低很多,因而市场半径一直较大。早在先秦时期,可能就已经出现耕牛的中、长途贩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的“弦高犒师”大致可以反映这一事实。到宋代,耕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全国主要区域间的流动。史乘中多有两浙、湖南甚至福建等南方地区耕牛长期大量北贩至两淮、东京、河北一带记载^②,以致漆侠先生说:“北方不产牛,或者说产牛甚少,因而耕牛是来自南方的一项重要商品。从北宋初年,北方就仰仗南方的牛”。^③这说明,在宋代耕牛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尽管以现代市场眼光来看,这种关联水平还很低,各地区间牛价差异还较大。

宋代耕牛市场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本文方法的现实基础:只有在放任的市场条件下,才可以运用价值规律讨论价格问题,也只有各地耕牛价格有一定联系的前提下,才可以透过个别地点耕牛来反推全国整体水平。

二、宋代耕牛名义价格

首先来看北宋耕牛名义价格。北宋耕牛价格记载不多,就笔者所见有6条:

1、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政府卖给淮南通、泰、楚州盐场亭户牛,“诸处盐场亭户寔无牛具者,许令买置。召三人已上作保,赴都盐仓监官处印验,收入簿帐,给予为主,依例克纳盐贷……先准建隆中敕,每头减放一半价钱,更于每头上减钱一千外,余钱每一千只纳平盐二石……”^④

2、淳化五年(994)政府借贷给京西路缺牛农户3千钱,令赴江浙买牛。^⑤

3、大中祥符三年(1010)朝廷在开封县西郭省庄与各坊、监、苑囿中收购祭祀用特种毛色牛犊,省庄户3贯/头,坊监2贯/头;景祐五年(1038)三司建议:“祠祭用犊,预先并母拳养于牛羊司,候祭讫,

①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2《官政治绩·刘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② 宋廷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直接干预耕牛贸易,如宋夏、宋金对峙期间曾禁止边境耕牛贸易;再如一些丰收或歉收年景,政府偶尔也会直接干预牛价,如“景祐元年十二月一日……今来才得丰稔,人户收买耕牛之际,诏买卖牛畜钱于十分中量减二分”,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23,第50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以下简称《宋会要》),而且这些减价令的实际执行效果也很令人生疑。参见唐晔《宋代政府对耕牛贸易的干预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

④ 《宋会要》,食货23之31,第5190页。

⑤ 《宋会要》食货1之16,第4809页。

犊支钱五千,母给本主。今后,母给钱,免妨耕种。”^①

4、大观四年(1110),臣僚言“伏见无知之民,日以屠牛取利者,所在有之。比年朝廷虽增严法度,然亦未能止绝。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每斤直(值)需百钱,故人多贪利而不顾重刑。”^②

5、许景衡(1072—1128)诗曰:“一牛动是万钱值,墨指一作何纷纭。安得田家真有此,坐令四海无饥民。”^③

6、宣和五年(1123),宋廷在乐清县将“拘收贼人遗下耕牛五千六百余头给与人户,每头一十贯文”,以所得价钱抚恤阵亡兵士。^④

此六条记载中史料价值最高者当属后三条,它们较为精确且集中地反映了北宋末期耕牛常价。第4条,“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无疑说的是大观四年开封周边地区耕牛之常价;第5条“一牛动是万钱值”,据上下文意,所言亦是耕牛常价,但时间地点不明。考察作者生平,其活动区域集中于两浙、河北、东京,因此,此记载当是宋末此三地中某处牛价。第6条中“每头一十贯文”为战乱后政府与民户交易,情况有些特殊,但所定价钱也应当参考市价,且可与许景衡诗句基本相互印证,当与市价相差不远。通过这三条记载,基本可以认定,在北宋末期开封周边及两浙地区耕牛之常价在5—10贯之间。

材料二、三价值稍差:对于材料二中的3贯,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否为牛价全额,因为我们无法排除政府提供的贷款只是部分牛价(或是牛价加路费)的可能性;^⑤而材料3中牛犊是祭祀所用,毛色等方面有特殊要求,非同一般耕牛,而且朝廷与坊、监等之间交易亦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因此此处牛价肯定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异。尽管如此,这两材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至于材料1,则几乎没有价值,完全无法推断当时牛价,^⑥因而本文不再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考虑到北宋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趋势,末期应是其物价的高峰,同时开封周边及两浙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宋代物价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经济越发达地区,其商品名义价格越高),且开封又是耕牛输入地区,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价格就是北宋耕牛常价之高位。

顺便提一下,程民生先生曾据此六条材料得出结论:“北宋时期的牛价,经历了从大约2贯余到10贯的清晰轨迹”^⑦。北宋耕牛价格基本走势为不断上升的观点,笔者基本认同,笔者不同意见主要在于:一,提法过粗。此六条材料反映的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市场条件下的牛价。北宋前后160余年,幅员万里,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低(即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价格差异极大)的条件下,仅仅靠六个不同时间、地区的价格点来代表当时全国市场价格变化曲线,失之于过粗。例如,南方一直向北方输送耕牛,在当时的条件下,长途贩运成本之高可想而知,由此算来,两湖、广东、福建等输出地牛价肯定会比北方的京东,京西,河北等输入地低很多。因此如果笼统的谈北宋牛价曲线,肯定不妥;二,对于材料1、2、3的解读,笔者认为亦可商榷,理由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言。

再看南宋。南宋初年牛价暴涨,宋金边界的两淮以及临近地区牛价最高达到过百贯上下。周紫

① 《宋会要》礼26之9,第1008页。

② 《宋会要》刑法2之52,第6521页。

③ [宋]许景衡:《横塘集》,卷6《墨牛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会要》兵18之23,第7055页。

⑤ 漆侠先生和程民生先生都曾据此断定宋初牛价为3贯,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第399页;程民生:《宋代牲畜价格考》,《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⑥ 程民生先生将之解读为牛价2贯(《宋代牲畜价格考》,《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他似乎是将“更于每头上减钱一千外”解读为对上句“钱一千外”的同意重复,由此得出结论:“按建隆年间的规定,每头一半的价钱是1贯,则是宋太祖时大约2贯钱可以买到一头牛”。笔者以为此材料应解读为:每头牛减价一半基础上,再减一千文,之后剩余价钱,按照每千文一石盐折纳,因此不能推算出当时牛价为2贯。

⑦ 程民生:《宋代牲畜价格考》,《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芝在绍兴六年(1136)一封书信中谈道:“初,伯远约以春耕,而仆无牛,市一牛需百千”;^①同年,宋廷屯田两淮,以低价调拨官牛给予农户,要价百贯(省),合足钱77贯。^②同是绍兴初,湖南饥荒,“田莱不辟,米价翔踊。而两广帅司闭籩,且禁耕牛出境,一牛值钱百千”。^③此时之高价,显然是战乱摧残之故。两宋之交,京西、两淮、湖北等地一直战乱不断,社会动荡,耕牛损失巨大,“民间耕牛累年以来,屡遭兵火,宰杀殆尽”。^④此外,绍兴九年(1139)发生了两宋史有记载的上最为严重的牛瘟,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牛价,据记载当时“不但牛而已,虽虎、豹、麋、鹿、猿、獐、野兽等弃死山林、原野”,波及区域包括了除两浙、福建、两广以外所有地区。^⑤如此情形之下,牛价自然高昂。

绍兴和议之后,政局渐趋安稳,牛价有所下降,但仍大大高于北宋水平。孝宗乾道四年(1168)十一月,官员徐子寅在奏章中称两淮牛价高达80贯,几乎是当地一般农户房产及基本农具价值总和的两倍,而即便在牛价相对低廉的“内地”,一头牛也要40贯上下。

两淮议营田、屯田……淮上治田之具,盖每招一家,必首给钱百二十缗,以其二买牛,一为室庐耒耜之资。是知淮上不唯人稀,牛亦艰得,固应倍于内地,费亦寔重。^⑥

此处之“内地”,无疑是指远离边境的耕牛输出区。既是耕牛输出区,其牛价在当时属于较低水平,而40贯,几乎是北宋牛价最高水平的四倍。

还是孝宗年间,湖北鄂州一农民贷官钱30贯买牛犊。^⑦牛犊30贯,成牛价格一定还要高不少;绍熙年间(1190—1194),陆游致仕,归越州(今浙江绍兴)欲买“黄犊”,卖家索钱20余贯,^⑧两浙是南宋耕牛最大产区与输出区之一,因此不会是南宋牛价最高的区域,但黄牛犊亦达20余贯,已大大高于北宋末成牛价格;陆游又有“万钱近县买黄犊,襁褓行当东作时”之语。^⑨黄牛犊10贯,这是南宋牛犊价格记载中的最低水平,但依然达到了北宋成牛价格之最高水平。

此外,洪迈笔记小说《夷坚志》中还有数处牛犊价记载。《夷坚丙志》卷七《大渎尤生》:绍兴三年(1133)长洲(今苏州境内)一牛犊20贯,卖家仍嫌价低;《夷坚丁志》卷五《师逸来生债》:福建建阳一牛犊卖价10贯;《夷坚三志》辛集卷七《张三公做牛》,一水牛犊售价25贯;《夷坚补志》卷七《直塘风雹》:乾道初,鄂州(湖北)农民300贯买母子二牛。《夷坚志》虽属志怪小说,事多荒诞,但其中生活场景描写仍有一定现实性,可作为参考,佐证当时之牛价之高。

孝宗朝是南宋社会经济情况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基本平息,社会稳定,物价相对低平,其牛价水平自应处于南宋耕牛价格曲线的低点,而且样本点也选取在了当时价格理应相对较低的“内地”,因此可以断定这些样本点应当是处于南宋耕牛价格曲线的底端(即南宋一头耕牛常价,一般不低于40贯),但就是这个底端价格依然大大高于北宋牛价的高点。

三、宋代耕牛实际价格

毫无疑问,南宋耕牛名义价格远高于北宋,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供求关系的实质性改变,因为它完全可能是币值波动的结果。宋代货币发行混乱,不同时期货币购买力相差悬殊,因此,若要说明宋代

①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49《答田卷示徐伯述》,《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版。

② 绍兴六年,都督行府言:“乞令提领江淮等路营田司,于见寄养牛内,就近支拨三百头付寿春府,一百头付濠州定远县……借给归业人户耕种,免纳租课。候收成日,与作五年还纳,每牛一头,止令纳钱一百贯省。”见《宋会要》,食货2之19,第4834页。

③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会要》,食货63之197,第6085页。

⑤ [宋]叶梦得:《建康集》,《又与秦相公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庄绰:《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均有类似记载。

⑥ [宋]楼钥:《攻媿集》卷91《直秘阁广东提刑徐公行状》,《丛书集成》本。

⑦ 《陆游集·渭南文集》卷37,《朝议大夫张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45页。

⑧ 《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8《跋刘凝之陈令举骑牛图》,第2251页。

⑨ 《陆游集·剑南诗稿》卷59《农舍》,第1427页。

耕牛供求变动情况,必须引入实际价格,因此笔者通过主粮(米、麦)折算出耕牛实际价格。

耕牛实际价格折算的关键在于确定粮价。最理想的状态是能找到与牛价样本时间、地点相同的粮食常价,但由于史料限制,完全匹配很难,只能尽力寻找近似时段与地区粮价。^①

关于北宋末期粮价,只有两个较为合适的记载:一是大观二年(1108)京西北路温县小麦每斗120文,汝阴每斗112文^②。揆诸史乘,其时其地并未有大的天灾人祸,此价当是常价;同时这一数据在时间上与“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的大观四年(1110)只差两年左右,其所处地点距开封也较近,因此最为合用。引文中两县麦价稍有差别,为方便计算我们取均值116文/斗,即1.16贯/石。依此价格计算,5—7贯钱能买麦4.31—6.03石;另一则较为合用的记载是宣和四年(1122)榷货务称:“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每石米价不过六百,是时盐价每斤六七十;今来价每硕二贯五至三贯……”。^③此数据在时间上与宋廷在乐清卖牛的宣和五年基本吻合,由引文来看,记载的也是常价。米价每石2.5—3贯,^④牛10贯,折米3.64—4石。榷货务所报米价应为当时东京附近米价,而乐清在浙东,属大米输出地,米价一般低于京城不少,如估作每石2贯计,则折米5石,仍低于东京牛价。东京是耕牛输入地,浙江是输出地,因此东京牛价稍高于两浙亦属合理。

北宋中前期牛价虽不能确定,但亦可大致折算,作为参考。北宋早期年间,粮价低平,淳化五年(994)两浙粮价未见记载,前后记载最近是大中祥符六年(1013),杭、润两州斗米六十文,不过此时因淮南歉收致两浙米价上涨后的情况,^⑤正常年景米价应稍低,如果以50文/斗计,^⑥则宋廷所贷农户3贯买牛钱,可折算米6石。

再看南宋。绍兴初年情况特殊,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不断,粮价暴涨暴跌,高时能达到20、30贯/石,低时不过2、3贯/石^⑦,无法确定常价,略去不谈。孝宗乾道年间,社会秩序已经平稳,江浙、两淮、湖南、湖北等地米价稳定在2贯/石上下,如乾道二年(1166):

监行在省仓下借兼户部和余场郑人杰言: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门、沙市、鄂州管下舟车辐凑,米价亦不过两千。^⑧

这是湖北丰收年景,米价在1—2贯/石;又,乾道三年(1167):

臣僚言:“临安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民间缺食,多谒富家借贷。每借一斗,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今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⑨

① 彭信威先生曾以10年为单位对宋代粮价做过估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7页)。彭在注释中说明其所用方法为“取约230个数据”,“一年以内用算数平均法,一年以上的如十年期、半世纪、一世纪等都用几何平均法”。笔者认为如此测算的出结论偏差过大,甚至笼统提出宋代米价概念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地区米价相差甚大,因而本文并未采用彭先生的方法与数据。

② 《宋会要》,食货7之22,第4916页,载:“京西路臣僚言:本路诸州以盐杂钱折变物料,数年以来,物价滋长……大观二年小麦孟州温县实直(值)为钱一百二十,而折科止五十二,颍州汝阴县为钱一百一十二,折科止三十七……”

③ 《宋会要》,食货25之17,第5223页。

④ 这个价格比上文所引温县、汝阴麦价高出不少。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方以麦为主产,米则多由南方输入,米价价格自然较高;二是,此价为榷货务上奏,应是京城价格,京城价格要高于周边州县。

⑤ 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乙巳“杭、润等州,米斗钱六十,盖淮泗不稔,行商贩鬻,致有曾价。”[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15页。

⑥ 汪圣铎先生亦认为“宋代中前期正常情况下的米价大约在每石五百文足上下浮动”。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⑦ 绍兴元年正月己卯:“时鼎(州)之诸县,大半为贼所据,赋入极少,米贵斗值二千”,[宋]李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93页;绍兴2年,7月乙亥载,“常、润、苏、秀诸州大稔……米斗二百文”,[宋]熊克:《中兴小纪》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页。

⑧ 《宋会要》食货40之44,第5530页。

⑨ 《宋会要》食货58之5,第5823页。

此处说的是浙西、临安一带常态,秋收后米价低廉,一般在120—130文/斗,即1.2—1.3贯/石;而歉收之年冬、春缺粮时节,借贷价格500文/斗,去“倍称之息”,市价不过250文/斗,即2.5贯/石,全年平均起来不到2贯/石。这一时期,政府收税租、收籼米价要高一些,一般折钱2.31贯/石(3贯省/石)左右:如乾道六年(1170)二月八日,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主管官梁俊彦等上言:“沙田芦场……合纳租税……如愿折钱,以米一斗折钱三百”;^①同年四月十五日,户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使史正志言:户部去岁降本钱三百九十五万余贯,每斗三百文省为率,约籼米一百三十万石”。^②后一引文明确提到价格为“每斗三百文省”,据此推测,前一引文中“一斗折钱三百”也应是省贯。每石3贯省合每石2.31贯足。总之,这一时期价粮价水平在2贯/石上下。淮上成牛价80贯,约合米40石左右;“内里”牛价40贯左右合米20石;鄂州靠近“内里”,牛犊30贯,合米15石上下。

绍熙年间粮价稍涨。绍熙五年(1194),检正都司言:“照得元立纳米补官赏格,系以丰年米价为准,每石只计钱两贯,委为太轻。耿延年所请却系大荒米价,甚贵之年每石计钱四贯,委是太重”^③,据此我们取中数也是3贯/石。陆游提到的浙西黄牛犊价20余贯可买米7石上下。

采用实际价格比较的结果依然是南宋牛价远高于北宋。

表1 宋代成牛价格

时间	名义价格:贯/头	粮价:贯/石	实际价格:石/头	地区	备注
淳化五年	3	0.5	6(米)	两浙	误差可能较大
大观四年	5—7	1.16(麦)	4.31—6.03(麦)	东京一带	常价
宣和五年	10	2(米)	3.64—5.00(米)	浙东乐清县	近似常价
北宋末	10	2.5—3	3.33—4.00(米)	东京、河北、两浙中某处	常价
绍兴六年	77	不详	不详	淮西寿春、濠州	政府优惠价
绍兴六年	100	不详	不详	不详	动荡时期
绍兴初	100	不详	不详	湖南	动荡时期
乾道四年	80	约2	约40(米)	两淮地区	特殊地区常价
乾道四年	40	约2	约20(米)	“内地”	推测常价

表2 宋代牛犊价格

时间	名义价格:贯/头	米价:贯/石	实际价格:头/石	地区	备注
大中祥符三年	2—3	不详		开封	国家祭祀用牛犊
景祐五年	5	不详		开封	国家祭祀用牛犊
绍熙年间	20余	3	7	浙东	黄牛犊,常价
孝宗年间	30	约3	10	湖北鄂州	牛犊,常价
孝宗年间	10	约3	3.33	不详	黄牛犊

五、结语

宋代农户购买一头耕牛意味着什么?依上面结论,北宋耕牛常价一般不超过6石小麦,而在牛价稍低的两浙,则不超过5石米。学界一般认为宋代家庭规模平均5口,如果按人均日需口粮1升计算,^④6石小麦可供一户小农食用120天,而5石米则不过是一个小农家庭100天,即3个多月的口粮。考虑到耕牛实际价值,这一负担确实不算很重。其实,前引大观四年引文中“盖一牛之价不过

① 《宋会要》食货1之45,第4824页。

② 《宋会要》食货40之49,第5533页。

③ 《宋会要》职官62之35,第5966页。

④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1《行军运粮》中提出,人均日口粮为两升(见胡道静著《新校正〈梦溪笔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但那是壮丁重体力劳动情况下的标准,日常生活不会如此。当今学者,如斯波义信、李伯重等,都按农户老幼人均一天一升计算,(参见李伯重:《“选精”、“集萃”与江南宋代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每斤直(值)需百钱”之语，即指明了当时耕牛价格已被扭曲，大大低于其价值的事实。李根蟠先生曾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农业使用耕牛的普及期或者说高峰期，^①从北宋耕牛价格结论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而到了南宋，即使是价格最低的中期，两淮地区一头成牛也要折米 40 石上下，这大约是一个小农家庭 800 天之口粮；江浙地区牛价低一些(20 石米)，约 400 天的口粮。价格是供求关系的直接表现，牛价急剧上升，说明耕牛供求关系严重恶化，农户置办耕牛困难程度大为提高。耕牛供给严重紧张，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和小农家庭的进一步贫困化。学界对于南宋经济发展程度一直有争议，一派学者认为，相比较于北宋，南宋经济残破，有较大衰退；而另一派学者则坚持，南宋经济在北宋基础上有相当发展。从本文结论来看，显然前一种结论更接近事实。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南宋牛价大涨？南宋初期及后期的牛价高涨，自然是战乱及社会动荡的结果，但在政局较为平和的中期为何依旧不能回落至北宋水平？笔者认为这依旧可以用战争影响来解释。首先南宋中期时间不长，而且其政局和平也只是相对而言，期间依然爆发了数次战争，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南宋始终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因而一直在保持着扩充军备。牛皮、牛角、牛筋都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在军备紧迫而又巨大的需求压力下，耕牛必然会被大量屠宰以供军需，这必然会对社会耕牛保有量产生重大影响，牛价下降也就成了自然之事。^②

必须承认受数据所限，本文对宋代牛价的蠡测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估计，尤其在实际价格估测中，很多数据被迫做了简化处理。例如在粮价取值时涉及的“短陌”问题。宋代币制混乱，各地，甚至各行都有各自不同的“短陌”习惯，但多数史料中并不载明，因此本文被迫按照除非载明，否则一律视为足贯的原则处理；再如衡制，宋代衡制标准同样混乱，不同地区石、斗容积可能都有差别，但本文也只能按统一标准来处理。所有这些都导致对牛价估测的误差，因此本文对耕牛估测结果远非精确数据，但如果将其视作一个价格水平的大体估测，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就南宋耕牛价格远高于北宋这一结论而言，完全可以成立，因为价差如此之大，完全不是上述数据误差所能导致的。

Study on Cattle Prices in Song Dynasty

Tang Ye Zhang 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 the cattle pric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point out tha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market price of cattle is usually no more than 10 Guan of coppers, convert into not more than 5 Dan rice; bu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war, cattle prices rose significantly, the nominal price rose to 100 Guan in the early years, even to medium-term, the lowest price of cattle is maintain at least about 40 Guan, convert into 20 Dan rice. Cattle prices rising display Southern farmers will have more difficult when they want buy cattle, so we can think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attle; Price; Agriculture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李根蟠:《中国精耕细作的两种类型和牛耕使用的变化——关于传统经济再评价的两个问题》,《史苑》第8辑,第56页。

② 当然,如果单纯从理论角度看,耕牛价格上升也可能是由于需求大增造成,学界确实也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农业发展,耕牛需求增大,导致了耕牛价格在长期趋势上有呈上升态势,但这一解释显然不适用于此处。首先,此种说法说的是一种长期缓慢趋势,而南宋情况则属于短时间内的剧烈价格抬升;其次,就南宋具体情况而言,传统上的北方耕牛输入区的丧失以及两淮地区大量抛荒使得南宋耕地面积较之北宋大为减少,因此南宋农业对耕牛需求不可能有大的增长。